

從“編輯學者化”到“學者化編輯”

陳 穎

何謂“學者”？《現代漢語詞典》對“學者”的釋詞是指“在學術上有一定成就的人”。這就清晰界定了學術成就乃學者的基本標誌。而學術成就又從何而來，只有從學術研究中來。換言之，一個人不從事學術研究，就無學術成就可言，也就與學者稱號無緣。如此簡單的邏輯關係，四十年來在學報編輯群體中卻成了一個理論和實踐均遭遇困境的難題。近日，朱劍先生在《清華大學學報》和《澳門理工學報》發表了兩篇文章，前者回顧了近四十年來學術期刊主要是高校學報編輯身份定位的困惑和焦慮，涉及學報編輯這一特殊群體自身身份建構和外部關係的方方面面，可謂體大慮深，如醍醐灌頂，令人茅塞頓開。後者則專門針對三十多年來“編輯學者化”討論的來龍去脈和主要觀點進行了辨析，再次引起了學報界對“編輯學者化”問題的熱議。本文主要結合自己三十多年從事高校學報編輯工作和學術研究的經驗，從實踐層面呼應和論證朱劍這兩篇文章所討論的“編輯學者化”這一經久不衰的重要問題。

一、學報“編輯學者化”是一條可行的路徑

1980 年代中期，大學畢業後由於偶然的原因我加入了高校學報編輯隊伍。此時的中國高校學報正處於由“文革”中遭到停頓走向逐漸復甦的時期，學報的單一政治屬性也逐漸向政治與學術的雙重屬性轉化。這也是直接影響到學報從業者的身份定位並觸發長期焦慮的關鍵時期，即朱劍所言學術期刊由“編研一體”向編研分離的體制定型並強化的時期。由於國家開始建立和規範編輯職稱制度，高校教師與學報編輯的崗位職責與身份定位逐漸分離並各自明晰，此時又恰逢恢復高考後的最初幾屆大學畢業生陸續加入學報編輯隊伍，這些人一腳踩入學報門檻，身份便被固化，即只能參評編輯系列職稱，而與教師職稱無緣。誰都知道，在高校，任何時候教師都是主體，教學科研是絕對主流，而學報編輯是被明確定位為科研教學服務的，學報編輯部注定處於邊緣位置。更何況，在許多高校，學報編輯部還被劃歸機關黨政部門的下屬單位，成為似行政非行政、似專業非專業的單位（如今已用“教輔”統一稱謂之），學報編輯與教師不能夠平起平坐是顯而易見的。一些高校甚至對學報編輯的待遇和學術權利加以種種限制，如規定學報編輯無權申報各類縱向科研課題、不能參評一些科研獎項等等。如此一來，對多數學報編輯而言，升遷行政職位既無望，又不能獲得應有的科研權利，豈能不產生身份焦慮。而我正趕上這樣的特殊歷史時期，懵懵懂懂成了一名學報編輯。

初入學報行業的我，無異於一個鄉下人初入車水馬龍的大城市，四顧茫然不知何往。更由於特殊原因，到學報編輯部的頭幾年，我被安排擔任的是非我本科專業（中文）的教育學、心理學的責編，對於手頭的來稿，讀懂尚且不易，更何談所謂“學術引領”。即便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歷練，

已經擔任學報主編十多年的今天的我，也對學報界某些人士動輒妄談所謂“學術引領”之豪言壯語感到臉紅心跳。如果是一個如王學典、吳承學這樣已經著作等身的知名學者來談“學術引領”尚可令人心悅誠服，但個別無法代表一般，特殊說明不了普遍。對於多數從業之始身份即固化為編輯的學報人來說，其與學術共同體實際存在或遠或近的疏離，能夠成為某學科專業學術權威的應屬鳳毛麟角，“學術引領”談何容易。我發現，朱劍在《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的第六部分在談到學術期刊及其編輯的“學術引領”問題時，質疑者多是半路出家擔任學報主編的知名學者，他們集學者與編輯身份於一身，實際是“編研一體”的學術共同體內的權威人士。眾所周知，高校學報的綜合性決定了編輯多數需要一身二任或多任，即多數學報編輯需要一人負責兩個以上一級或二級學科的編輯工作，對於自己已經熟悉或學有所長的二級學科有所鑽研尚屬不易，更何況是自己並不熟悉的其他學科。這裡有必要重述朱劍在《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一文中所引的一段話：“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編輯人員素質的提高是有限度的……任何一個編輯人員，哪怕他再有天賦，也無法通曉整個一級學科，更不要說其他一級學科了。”（俞吾金：《文科學術期刊建設之我見》，上海：《文匯報》，2004年12月12日）我曾經試圖通過到相關院系旁聽一些本科專業課的辦法彌補缺憾，但收效不大，因為學報要刊用的論文是要超越該學科一般知識的學術創新理論。當然，1980年代，學報界尚無“引領學術”之說，我感到焦慮的並不是自己缺乏“引領學術”的能力和水平，而是擔心自己不能勝任學報編輯這個角色。但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當學報編輯免不了要和學者打交道。在那個年代，作者的論文還處於手寫階段，校內作者投稿也要親自到編輯部，編輯與作者是抬頭不見低頭見。雖然理論上編輯掌控著發稿的主動權，但能否準確判斷一篇論文的學術水平和不足，幫助作者修改潤色最終達到發表要求，對於一個初入行且專業並不十分對口的年輕人來說，的確是一個難題，更遑論與大牌作者進行學術對話的底氣了。如今，絕大多數學報青年編輯初入行即具備很高的學歷，經過專業學術訓練，較少遇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學報青年編輯面對的困惑。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回首自己走過的編研歷程，我的體會是，對青年編輯學術上的成長而言，倡導“學者化”是一條路徑。所謂“學者化”既是一個理想和目標，也是提高編輯業務水平的過程與手段，更是擺脫身份焦慮提高學術地位的唯一路徑。在高校，學報編輯崗位相對教師崗位，發展空間可能會狹小些，但它畢竟也是一個學術平台，存在著學術上發展的無限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能否變成現實，全在於青年編輯入職之初是否給自己設定了理想和奮鬥的目標，並且矢志不渝地追求。“編輯學者化”與提高編輯的業務水平有必然聯繫嗎？答案也是肯定的。實際上，在學報編輯的各種業務能力中，審稿能力是核心，而審稿能力又是建基於學術水平之上的。編輯的“學者化”與教師的“學者化”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在某個學科領域某個方向有系統的學術研究，不一樣的是，編輯的學術研究有時能夠與學報的審稿結合起來。

朱劍認為“專家匿名審稿制度逐步剛性化，給了‘學者化’路徑致命的一擊”（朱劍：《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1978—2017年學術期刊史的一個側面》，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對此我不敢苟同。我以為，專家匿名審稿與編輯“學者化”並不矛盾，也不可能給“學者化”路徑致命一擊。編輯的學術研究有助於其對某些學科成果水平的判斷，但其所擔負的其他學科和方向的學報來稿，仍然需要借助該學科專家的匿名審稿。一個學報主編或編輯，無論其在某個學科學術造詣有多深，都不可能精通所有學科。綜合性學報編輯必然要讓渡部分審稿權，專家匿名審稿乃學報審稿不可或缺的基礎環節，與編輯“學者化”的努力並不矛盾。

二、“學者化編輯”是能夠實現的目標

對於高校社科學報編輯來說，在學術修煉這一點上，與高校教師路徑沒有區別。人文社科學術研究主要靠對學術動態的瞭解、研究資料的搜集、大量文獻的閱讀，加上必要的邏輯歸納和演繹，最後化為筆底流暢清晰的文字表達。這些思維能力和筆頭功夫，無關乎編輯或教師的身份。何況，學報編輯還具備教師所不及的兩個天然優勢：一是學報這個發表成果的近水樓台，二是編輯工作之餘開展學術研究比較充裕的時間。我不諱言，我所以能夠在學報這個“邊地”紮下根，潛心編研，很大程度是看中了學報這兩個優勢。幸運的是，我所就職的編輯部具有比較濃郁的學術研究氛圍，老一輩編輯各有學術研究領域方向，有的還成果斐然，是某一領域的知名學者。受他們潛移默化的影響，我深感自己如果不在學術研究上有所努力和作為，將無立身之地。但本科出身的我，學術基礎不夠扎實，在摸索了將近十年後，才選定中國戰爭小說作為學術研究的礦藏。

恰在我初步選定學術研究方向並進入編輯生涯第二個十年的重要關頭，學報界開始熱議“編輯學者化”問題，時任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理事長楊煥章先生是“編輯學者化”的積極倡導者。1994年6月，在參加研究會第一次青年編輯學術研討會上，有幸親耳聆聽楊煥章先生關於學報編輯必須走“學者化”道路的理論闡述和現實分析，對於我堅定“編輯學者化”的追求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我對三十多年來延宕至今的“編輯學者化”之理論爭鳴並無深度瞭解，也未參與討論。我只堅信，與其坐而空談，不如起而行之，埋頭苦幹比空泛議論更實際。研究初期發表的長篇論文《20世紀中國戰爭小說概觀》等被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極大地增強了我的學術自信心。1996年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組織編寫五卷本“中國小說通史系列叢書”，我自告奮勇承擔了其中《中國英雄俠義小說通史》的編寫任務，於是有了我編研生涯的第一本學術專著。進入新千年，我利用在職攻讀博士研究生的機會，繼續深化中國戰爭小說研究，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戰爭小說史論》，於2008年10月由上海三聯書店正式出版，2009年獲評福建省第八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我不知道也不在意，此時的我是否能夠躋身學者之列，是否經過了“編輯學者化”的努力而終於成為“學者化編輯”，但我深信自己已經認真實踐了“編輯學者化”的倡導並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效。2009年開始我嘗試申報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海峽兩岸抗日小說比較研究》，但沒能成功，次年降格以求申報教育部社科研究項目，獲批立項，經過五年努力，2015年7月，《海峽兩岸抗日小說比較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並據此結項。三十年磨煉三本學術專著，差不多是“十年磨一劍”。所謂“編輯學者化”已經從早年的刻意追求成為如今無意識的自覺行為。2017年當我再次申報國家社科基金課題《20世紀中國反侵略戰爭小說研究》時，只是想給自己的“編輯學者化”努力畫上一個句號，因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斗膽申報重點項目，竟意外獲批。這應當算是我“編輯學者化”道路上的標誌性事件。

回顧自己三十多年的編研實踐，我清醒意識到，學術期刊的“編輯學者化”如果僅僅是為了擺脫身份焦慮進行所謂自我身份建構，而絲毫不考慮與編輯工作的關係，則“編輯學者化”的方向便值得懷疑。這實際是關乎編與研能否相得益彰的問題。這裡，有必要判明一個前提，即所謂“編輯學者化”是否只是針對編輯學以外的其他學科專業的學術研究，編輯學研究成果算不算學術成果。令人沮喪的是，在現行學科專業門類中我們竟然找不到編輯學這一學科，只能勉強寄身到“新聞學與傳播學”一級學科門類或二級學科“傳播學”下。所謂“編輯學”幾乎只能在出版行業中得到有限承認，這是否意味著編輯對於自身工作性質、規律、方法以及出版業發展歷史、

發展方向等的研究就不是學術研究，而只能算工作探討呢？對此，見仁見智，無法定論。但是，編輯學研究對於編輯業務水平提高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同教學研究對於教師教學水平的提高毋庸置疑一樣。但也不可否認，相較於文史哲政經法等積澱深厚的傳統學科，編輯學和學科教學法等的研究的確帶有工作探討的性質，在有些學者眼裡是不入流的“小兒科”，所以“編輯學者化”主要是針對編輯學以外的其他學科專業的學術研究。對於學報編輯而言，這樣的專業研究不是單純為了學術而學術，而是為了提高專業水平，服務於編輯工作。正如朱劍的兩篇文章所分析，學報界資深編輯，無論王英志，還是楊煥章，其“編輯學者化”倡導的目的和指向，都是對著自己所負責的學科，只有“對自己所負責的學科……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具有比較專門系統的學問……在某一學科方面有發言權、有學術建樹”（王英志：《學報編輯學者化略論》，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一個稱職的學報編輯，應當能夠獨立地制定選題計劃，應當能夠獨立地鑒別稿件，應當能夠獨立指出稿件的不足以幫助提高稿件的水平，應當能夠跟作者就稿件進行磋商。這些都是最起碼的要求，而這每一項要求都需要編輯成為相應專業的專家學者”。（楊煥章：《談談學報編輯學者化問題》，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6期）很明顯，王英志、楊煥章的邏輯前提是，只有對自己所負責學科專業有專門系統深入的研究，才能與作者進行學術對話，才能準確判斷來稿的學術水平，幫助作者提高稿件的水平。這樣的邏輯判斷固然不謬，但從我本人三十多年學報編輯工作的實踐經驗看，這樣的理論期盼在實踐中很難圓洽，是由於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多學科特點所決定。

那麼，編輯學研究又如何？對於學術期刊編輯來說，編輯學研究成果毫無疑義也是學術成果，否則，又如何解釋出版系列專業技術職務評審時非有編輯學研究成果不可。如我這樣大學畢業即從事編輯工作的比較純粹的學報人，那怕我的文學專業研究成果再豐富，學術水平再高，如果沒有任何編輯學研究成果，則與出版專業職稱無緣，管理制度又把我評審教師或研究系列職稱的路堵死。學報界有多少編輯都是因為評審職稱所逼才去寫編輯學論文，如朱劍這樣懷著博大情懷關心學報的前途命運，真正對編輯學有系統研究和獨到見解的學者，學報界能有幾人？雖然我也發表了將近四十篇所謂編輯學論文，但我不諱言，其中相當部分是為應付學術研討會而杜撰的。

三、結語

在現行出版管理制度和學術體制下，無論是出於擺脫焦慮進行身份建構的目的，還是為了做好編輯工作，學術期刊編輯都必須走“編輯學者化”的道路。我的三十多年編研實踐啟示，從“編輯學者化”到實現“學者化編輯”，這條路走得通，關鍵是學報編輯們願不願意走，是否有克服困難的決心和意志。“編輯學者化”對於提高編輯業務素養和學術水平有作用，但高校綜合性學報的性質和特點又決定了這種作用的有限性，我們必須準確、客觀評價“編輯學者化”的效果並對其保持清醒認識，那種企望通過“編輯學者化”的號召和實踐能夠實現編輯對於學者的超越，甚至“引領學術”，都是不切實際的拔高和夢囈。近四十年，編輯逐漸脫離學術共同體和學者分離，是現行學術期刊出版管理體制造成的，也與高校社科學報的綜合性有一定關係。學報編輯欲真正“學者化”，徹底擺脫身份焦慮，只有回歸學術共同體，而學報從綜合性向專業化轉型是編輯回歸學術共同體的一條路徑，但最終只能寄望於期刊管理制度的改革，讓“編研分離”重回“編研一體”。

（作者係《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主任、主編，編審）

[責任編輯 劉澤生]